

南海之間，有衣冠之氣

「大灣」之光系列（一）

姜舜源（文／圖）

目前如火如荼展開的「粵港澳大灣區」建設，包括香港、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東莞、中山、江門、肇慶九個珠三角城市，基本上是「嶺南文化」所在區域。根據經濟、文化相互促進的發展規律，單從嶺南文化角度看，「大灣區」發展作為國家戰略，其遠大前程也是毋庸置疑的。就像「江南」一直文化繁榮，宋元明清以來「江南」一直是國家經濟命脈一樣。歷史上經濟社會發達而造就了「嶺南文化」，「嶺南文化」的特殊基因又反過來推動社會進步。例如，開放多元、敢為人先的嶺南性格，提供了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社會環境，這是大灣區由史至今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。

一個時代，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，應該帶來文化繁榮昌明；一個文明古國、文化大國，除總體的民族文化高度發達之外，還往往具有豐富多彩、百花齊放的地域文化。「嶺南文化」，就是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一枝絢麗的地域文化之花。她不是明清甚至近代以來，才忽然異軍突起、大放異彩的。漢文帝元年（前一七九年），陸賈受命來到南越，說服趙佗接受漢朝廷領導，回京撰《南越行紀》，向中原地區推介嶺南。經歷了西晉末年戰亂，「衣冠南渡」江南的著名學者郭璞（二七六至三二四年），當時就指稱：「南海之間，有衣冠之氣。」（明吳國倫《戲甄洞稿，廣東鄉試錄序》）南海之間，就是南嶺至粵海之間嶺南地區；衣冠之氣，就是文明教化之風。

比郭璞稍晚，被譽為東晉「中興才學之宗」的葛洪（字稚川，號抱朴子，二八四至三六四年），舉家遷居嶺南惠州羅浮山隱居，一邊煉丹，作永、丹之間分解與還原的可逆性化學實驗，一邊撰寫《抱朴子》及《金匱藥方》、《肘後備急方》等著作。元代畫家王蒙以此為題材創作名畫《葛稚川移居圖》（圖一），描寫葛洪帶著梅花鹿，其妻鮑姑懷抱幼兒騎在牛背上，一家老少連同男女僕人十餘口，行進在山間溪橋上。

原始玉器 遍布大灣

考古學發掘證實，早在新石器時代，嶺南就製造精美玉石器，其遺存遍布大灣區各地。其類型與中原華夏文明核心區一脈相承，其出土地密集程度不亞於中原地區。

香港屯門湧浪遺址出土距今六千年上下新石器時代晚期玉鉞（圖二），長十四點五、寬七點五厘米，刃部鋒利，上部正中有雙面鑽孔，用來穿綁木柄，作為實用武器。香港一號港寶，一九九〇年發現於南丫島大灣遺址的大玉璋（圖三），長二十一點八、刃寬四點六、體寬三、厚〇點七厘米，為距今三千年前商周時期玉器，與稍早的中原商周玉璋形制完全相同，是受中原禮制影響而在香港地區製造和使用的禮器，文化上的傳承關係顯而易見。

大嶼山發現的距今三千年前後，西周時期白芒紋飾作坊遺址中，有磨製玉料的工具礪石（即磨石），有開採但未經加工的玉料，有經初步加工的玉料、進一步加工的石芯，還有將石芯切割成玉玦後，內中更小的石芯再切割小一些的玉玦。加工程式一環扣一環，三千年前玉石加工場動態工序歷歷可見，顯示了當時物質文化生活發達程度。

一九六二年在嶼山石壁發現的人面弓形格青銅劍，埋藏兩千多年後重見天日，去鏽後金光耀目，劍刃鋒利，劍莖紋飾細如髮絲。說明三千年前，環珠江口地區已擺脫石器時代。這裏還有一件當時鑄造青銅斧使用的石質模具，是香港地

▲（圖三）香港南丫島大灣遺址出土商周時期「玉璋」
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藏



▲（圖一）元王蒙《葛稚川移居圖》（局部）
故宮博物院藏



▲（圖二）香港屯門湧浪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晚期「玉鉞」
香港古物古跡辦事處藏



▲（圖五）深圳南山區西麗水庫出土新石器晚期至商周「玉琮」
深圳市博物館藏



▲（圖六）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出土「玉玦殘件」
澳門博物館藏



▲（圖八）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漢「金鈎玉龍」
南越王墓博物館藏

區早期生產青銅器的重要證據。可以想見此地曾是爐火純青的青銅冶煉場，南海之濱與中原腹地一樣，有着輝煌的青銅文明。

實際上，深圳鹹頭嶺遺址發現的殘石塊，香港湧浪南區發現的磨光石環及石英環芯等，介於距今六千五百至五千七百年，是大灣區較早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。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玦（圖四）、環、水晶璜、石墜飾、耳璫、青石圭等，還有一批製造環狀類裝飾品的坯料；深圳南山區西麗水庫出土了新石器晚期至商周玉琮（圖五）；大梅沙出土商代玉玦等等。

一九九五年，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發掘大批石芯、石片、石核以及水晶殘塊、玉石殘環（圖六）等。從伴隨出土的大量礪石、環砥石等環形器製作工具看，這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，專業琢磨玉石環玦的作坊。到了商周時期，大灣區玉石環玦的作坊數量更多，像珠海平沙棠下環、香港屯門龍鼓上灘、大嶼山萬角嘴、大嶼山白芒等。遺址裏各階段的代表器物、成品和半成品俱存。這時期有的墓葬裏的玉石塊，與作坊裏產品大異其趣，推測是通過交換、貿易得來，說明六千



▲（圖十一）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漢「龍紋玉環」
南越王墓博物館藏



▲（圖四）珠海寶鏡灣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晚期「玉玦」
珠海市博物館藏



▲（圖九）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漢「玉璜」
南越王墓博物館藏



▲（圖十）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漢「犀形玉佩」
南越王墓博物館藏



▲（圖十二）廣州南越王墓出土西漢「越式鐵鼎」
南越王墓博物館藏



年前大灣區或許已經出現原始貿易。

南越王墓 動感玉雕

秦漢時代，兩廣一帶繼續發展。上世紀七、八、九十年代，相繼在廣州發現的秦代造船遺址、南越文王墓、南越國宮署遺址（圖七），證明歷史悠久的廣府不愧為嶺南首邑，出土文物與中原地區一脈相承，而又初步展現嶺南特色。

一九八三年，廣州市在象崗頂部開挖公寓樓牆基時，發現平整的大石板，好像地下建築，以為是七十年代挖的防空洞，後來證實是西漢第二代南越王趙昧的墓葬。陸續發現墓主身著「絲縷玉衣」，身上置有「帝印」、「泰子」金印和「趙昧」名章、「文帝行璽」龍鈕金印，總共發掘



▲（圖七）南越國宮署「萬歲」紋瓦當

出土一千多件（套）珍貴文物。

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玉器最多，為二百四十多件，除漢代帝王葬具玉衣、玉印之外，有玉璧、玉璜、玉環、組玉佩、舞人、玉劍飾、玉帶鉤（圖八）等等。與同時期中原玉雕雍容華美風格稍異，此處呈現出顯著的動感特色。

玉璜（圖九），長十四點一、中寬一點五、厚〇點三五厘米，青玉，黃白色。兩端為螭首，口部鏤空。雙面飾蒲紋。以凸起的稜線勾勒出螭首輪廓，眼睛、鼻翼、耳、腮和頰毛等，以陰線刻畫。廓外上下均有附飾，上為透雕雲紋，頂部尖凸如冠，鑽一小孔；下面透雕一對鳳鳥，造型華瞻。

犀形玉珮（圖十），長八點五、高四、厚〇點四厘米，青玉，黃白透青。雕琢成犀形，犀屈肢俯首，尾巴卷起，蓄勢待發，富於動感。璜體邊緣起稜，中飾渦紋，上弦有一鑽孔。犀的眼、角、蹄趾和尾等，均以陰刻的粗細線勾畫。

龍紋玉環（圖十一），直徑九、孔徑四點八、厚〇點四厘米，青玉，局部受沁，微有剝蝕。由透雕的二龍、二螭相互繞成一圈。龍、螭皆肌健浮凸，道勁有力，凌空飛騰，爭先恐後。兩兩相對，富有動感、力度。嶺南性格，鋒芒初露

玉組佩是周代以來貴族佩飾，走起路來環佩叮叮。此墓玉組珮復原長約六十八厘米。由玉、金、煤精、玻璃等不同質料的三十二個部件組成。自上而下依次是璧、小玉人、獸頭形飾、玉人、玉珠、玉璧、壺形飾、金珠、玻璃珠、玉璜、玉人、金珠、煤精珠、玉璜、玉人、玉珠、套環。它佩帶在墓主絲縷玉衣之上，彰顯墓主王侯身份。

「越式鐵鼎」領先技術

秦統一全國後，一身懷技藝的中原匠人來到嶺南，嶺南越族在自己已有文化基礎上，吸收中原及與毗鄰的楚、滇文化因素，創造了具有自身特徵的「越式」青銅器。此墓出土越式青銅鼎十七件，還有一件「越式大鐵鼎」（圖十二），是目前嶺南所見最大的鑄鐵鼎。鐵器最早出現於戰國時代，在漢初仍然屬於先進技術。

鐵鼎通高四十八、口徑三十點七、腹徑四十七點五、足高二十二點五厘米，重二十六點二公斤。鼎圓如罐，為深腹圓底，肩腹部上兩側各有一個可活動的環耳。腹下是三瘦長蹄足，三足微向外撇，腹間兩側有合範痕，具有明顯的越文化特徵，屬南越國當地自鑄。

嶺南地區缺乏鐵礦資源，冶鐵技術又比煉銅要求更高，因而鐵器廣泛使用晚於中原地區。以往的考古材料證明，秦漢時期嶺南已有鐵器生產。這件越式大鐵鼎表明，兩千多年前嶺南已經具備相當規模和技術的鐵器鑄造工業。

「搖漾桂水雲」 葛布「江雨空」

嶺南名勝、物產吸引着中原士大夫。按清康熙時《羅浮山志彙編》等史書統計，南朝謝靈運《羅浮山賦》，作文神遊惠州羅浮山；江淹《羅浮》稱「白雲炎海外」。唐代劉禹錫出任廣東連州刺史（行政長官），至羅浮山登飛雲峰頂，觀半夜日出，並作詩紀勝；王維《賀古樂器表》：「去載六月二十日，於南海葛洪居處，至誠祈請」。李白、杜甫、陳子昂等，都有很多嚮往羅浮山的詩篇。例如李白《禪房懷友人岑倫（原註：岑時南遊羅浮）》：「嬋娟羅浮月，搖漾桂水雲。美人竟獨往，而我安能群。……歸鴻度三湘，遊子在百粵。……目極何悠悠，梅花南嶺頭。」出任潮州太守的韓愈《贈羅浮僧元慧》：「前年往羅浮，步屐南海澗。」

李賀《羅浮山父與葛篇》，記載來自惠州羅浮山的仙長，贈送他一襲嶺南特產葛布製作的夏袍，此布「依依織江南空」；詩人穿在身上，「雨中六月蘭台風」；布匹質地有如瀟湘雲霞，剪裁技術有逾吳門織女：「欲剪湘中一尺天，吳娥莫道吳刀澀。」葛布，即麻布，一向是嶺南特產，筆者二十年前在故宮博物院工作時，保和殿寶座後海漫屏風隔扇，還是清代廣東所進葛布裝裱的。

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於熙寧元年（一〇六八年）出任廣州轉運判官，提點刑獄，平反冤獄。他嘗遊羅浮山，「坐卧白蓮池上，樂而忘返。」三年後在江西南康創作《愛蓮說》，與道教名山羅浮山薰陶、白蓮池的啟迪，不無關係。

本文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